

周恩来传

(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主编 金冲及

中央文献出版社

本卷目录

二十二、在武汉	(435)
二十三、东南行	(475)
二十四、到苏联疗伤	(507)
二十五、皖南事变前后	(518)
二十六、坚持在重庆(上)	(555)
二十七、坚持在重庆(下)	(589)
二十八、总结历史经验	(613)
二十九、新形势下的谈判	(626)
三十、抗战胜利和双十公告	(653)
三十一、政治协商会议和停战谈判	(676)
三十二、和谈的破裂	(709)
三十三、第二条战线	(735)
三十四、转战陕北	(754)
三十五、在西柏坡	(791)
三十六、和平谈判	(831)
三十七、建国前夕	(848)

二十二、在 武 汉

武汉，这个号称“九省通衢”的华中最重要的城市，当时已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中心。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的军政机关大部分迁到这里。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大多也集中在这里。《全民周刊》、《抗战》（以上两个刊物不久合并为《全民抗战》）、《抗战文艺》、《战地》、《自由中国》等进步刊物纷纷在武汉出版，使这里的政治空气十分活跃。中国共产党在这年九月间已派董必武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武汉。十月，成立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十二月初，叶剑英和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部分成员从南京撤退到武汉。不久，八路军办事处迁到汉口旧日租界中街八十九号大石洋行，由钱之光任处长。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机关刊物《群众》周刊，十二月十一日已在汉口公开出版；机关报《新华日报》也紧接着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于汉口公开出版。

周恩来同王明、博古、邓颖超等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到武汉的。二十一日晚，王明、周恩来、博古同蒋介石会谈，蒋介石提出要留王明“在汉相助”。^① 他们随即向中共中央汇报了

^① 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致洛甫、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37年12月21日。

会谈情况。二十三日，中共代表团同长江局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会上决定：第一，鉴于代表团同长江局成员大致相同，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合为一个组织，对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第二，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由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组成。第三，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以上三项需呈报中央政治局批准。第四，长江局下设五个机构：参谋处，叶剑英为参谋长；秘书处，李克农为秘书长；民运部，董必武兼部长；组织部，博古兼部长；党报委员会，王明任主席。^①

长江局的工作由王明主持。周恩来作为长江局副书记和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主要是负责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正如毛泽东这年十月间所说：“国共合作是这个团结的基础。”^② 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民族义愤的高涨，这时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他们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对待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态度比过去也有一些改变，但没有进行其他根本性的改革。

从国共关系来看，两党合作已经建立起来，并在一段时间内有了较融洽的合作气氛，但没有共同的政治纲领和合作的组织形式。这两个问题，便成了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中的主要内容。

当王明、周恩来、博古十二月二十一日晚同蒋介石第一次会谈时，周恩来对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决定共同纲领、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等问题提出具体建议。“蒋当面答复：所谈极

^① 《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长江中央局第一次联席会议》记录，1937年12月23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75页。

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彼所想的亦不过如此”，并且表示：“外敌不足虑，他欲前进困难愈多，（我国）军事虽失利并不足虑，只要内部团结，胜利定有把握。”^① 双方还就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问题达成了协议，中共方面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参加，国民党方面由陈立夫、康泽、刘健群、张冲参加。蒋介石说：今后两党关系，由陈立夫等与中共代表团共商一切。

第一步似乎开始得很好，前景仿佛很乐观。但事实上，对共同的政治纲领和合作的组织形式这些主要问题，国民党领导人并无意解决。他们对改善国共关系，只准备采取有限的、局部的措施，那就是邀请共产党人参加个别部门和个别机构。

一九三八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个部。蒋介石任命陈诚为政治部部长，并要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为此，陈诚亲自登门相请。同时，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也表示要周恩来到行政院任职，并由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出面相邀。^② 对这两项邀请，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最初都婉言推辞了。一月中旬，蒋介石坚持要周恩来就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二十一日，中共代表团电告中共中央说：“蒋、陈提及政治部副部长仍要周做”，周再三推辞，说做副部长可能引起两党磨擦，恐不妥。蒋仍要周做，并表示：不要怕磨擦，可以避免磨擦；政治工作方针是加强部队，发动民众；副部长职权可明确规定，能负其责；编制人事还未定，都可商量；康泽可以共事，不致捣乱；^③ 新政治部二月一日开始工作。中共代表团致中

① 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致洛甫、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37年12月21日。

② 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8年1月11日。

③ 王明、周恩来、博古、彭德怀、叶剑英、董必武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8年1月21日。

共中央的电报说：我们认为，孔祥熙为主和者，行政院方面应谢绝；政治部属军事范围，为推动政治工作、改造部队、坚持抗战、扩大我党影响，可以去担任职务。如果屡推不干，会使蒋、陈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合作者的意见得到加强。经过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①这是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军政部门担任的唯一要职。

蒋介石做出的另一姿态，是邀请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参政会。一月上旬，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的具体建议。他说：为了动员和组织全民参加抗战，采纳各种抗日的好建议，要有一个民意机关，既要有国共两党、救国会、国社党等以及无党派人士参加，也要吸收其他坚决抗日和真正代表民意的分子参加。各集团军亦可派代表参加，以增加坚持抗战分子在政府和军队中的力量。蒋介石表面上采纳了这个建议。七月一日，国民参政会成立。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共有七人：毛泽东、王明、博古、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除毛泽东请假外，其他六人都参加了国民参政会的第一次会议。

对改善两党关系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蒋介石仍采取拖延态度，或者不明确表示态度，或者答应了又改口变卦，使两党关系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那个同蒋介石当面商定的两党关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得仿佛很顺利，并且决定由周恩来、刘健群来起草两党共同纲领。但到第二次会议时，情况就起了变化。周恩来把他起草的共同纲领草案拿了出来，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却要把它移到下次再谈。以后，双方代表虽继续磋商，国民党中央却始终没有表示正式意见，共同纲领问题事实上被搁置起来，两党关系委员会形同虚设。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8年2月底至3月初。

至于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曾考虑可以有三种形式：“a. 恢复十三年（即一九二四年国民党一大时）的形式，使国民党改为民族革命联盟，其他党也加入；b. 建立共同委员会，在中央、各级共同讨论；c. 现在这种形式，遇事协商。”^① 其中的第三种形式只是“临时办法”。但蒋介石拒绝了前两种形式，剩下的办法只有一个：“临时协商”。

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两党的关系仍在原地踏步：采取遇事协商、随时约见的办法，主要在周恩来和蒋介石之间进行。由于蒋介石这时表面上还采取维护国共合作的姿态，周恩来利用这种形式，在反对一党专政、扩大民主成果方面还是取得了一点小的进展。

新的风波很快就起来了。领头掀起这场风波的是国民党的CC系、复兴社。他们在一九三八年初突然发动一场鼓吹“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宣传运动，鼓吹“今天国民党外的一切党派，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② 他们控制的《扫荡报》、《武汉时报》和《血路》、《抗战与文化》等报刊，在一、二月间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共文字。二月十日的《扫荡报》发表社论，公然声言中国有三种妨碍并破坏统一的因素，把陕甘宁边区说成是西北的新的封建割据区域，指责红军虽改易旗帜却不服从中央，并说在国民党外存在其他党派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统一，要求取消这三种势力。“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问题，在武汉三镇弄得满城风雨，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

二月六日，中共代表团与长江局联席会议，针对《扫荡报》等掀起的这场风波，决议：“起草向国民党建议书，指出取消各党派、限制信仰的错误，提议建立民族革命联盟，以更加巩固统

^① 周恩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9月30日。

^② 叶青：《关于政治党派》，转引自《血路》第2期，1938年1月22日。

一战线，并先电中央及国际请示。”^① 十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说明《扫荡报》等这种宣传运动的严重后果。蒋介石表示：对主义的信仰并不准备加以限制，孙中山已经说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并不矛盾，我们任何人都不能修改或反对；对各党派也无意取消或不容许它们的存在，只愿溶成一体。周恩来重申：国共两党都不能取消，“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蒋介石回答：可以研究。并说：《扫荡报》的言论不能代表国民党和他个人的意见。陈立夫补充说：蒋总裁已批评了《扫荡报》，要各报以后不再刊登这类文章。^②

这是一场试探性的攻势。鉴于时机还不成熟，以后一段时间内，国民党报刊上这类宣传内容确实减少了，但他们的一党专政的思想并没有什么改变。三月十二日，周恩来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一篇题为《怎样纪念孙先生的伟大》的文章，通过回顾历史教训，阐述了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意义。他说：孙中山先生的一个伟大特点，就是善于联合各种革命力量。“他根据每一个时期革命的需要，能将当时各种革命力量革命组织，特别看重的是群众组织联合一起，共同努力！”“这种伟大的革命精神正是目前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极端需要的。”^③

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认为这个纲领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十大纲领基本上是一致的，应该“坚决赞助其实现”，“今天的中心策略，

① 《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长江中央局第九次联席会议》记录，1938年2月6日。

② 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毛泽东、洛甫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并转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8年2月10日。

③ 《新华日报》，1938年3月12日。

不是要国民党定出一个更完善的纲领，而是站在主动的积极地位，帮助国民党实施这个纲领，在实施中发展与提高它”。^①《新华日报》还为此发表社论。可是，国民党以后并没有真正实施这个纲领。

国民党这次代表大会还宣布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当周恩来二月十日会见蒋介石时，陈立夫曾提出能否在两党以外组织一个由双方共同参加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作为合作的一种办法。由于对国民党的实际意图还不了解，周恩来没有立刻表示态度。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代表团说：“我们党对国民党一切口头上要做的好东西，如扩大国民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都应该采取积极赞助的态度。”“如果国民党不管我们的赞助，而仍然不能把自己所说的话实现起来，或把原来企图进步的东西变坏，如青年团变为特务机关，那人家决不会责备共产党的赞助不好，而只会骂国民党的顽固派混蛋。”^②六月九日，周恩来见蒋介石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提出应使三民主义青年团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来统一全国的青年运动。蒋介石表示国共两党可以共同训练，但坚持各党派不能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内活动。六月十六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青年书，公布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章，规定凡加入者不得参加任何党派行动。根据这个情况，中共代表团认为对三民主义青年团只能暂时采取静观的态度。

周恩来还同蒋介石就承认并扩大陕甘宁边区、补充并扩编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两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同样都没有结果。关于边区问题，周恩来等提出过多种方案。一九三八年二月十日，他们致电中共中央说：“今日见蒋，对边区借口各县是国

^① 《中央关于国民党临全大会后的策略问题致长江局电》，《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3页。

^② 《中央关于国民党临全大会后的策略问题致长江局电》，《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3页。

共两党县长并存制，有拖延意。”^①以后，这个问题就被搁置起来。关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扩编问题，这两支部队事实上在敌后已很快扩大，进行着英勇的抗日斗争，蒋介石却一直不肯给予承认。周恩来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电告中共中央说：“前晚见蒋，要他发枪。他答：连坏枪也发出了。宋美龄氏答：（来了）新枪可发。”^②一月中旬，彭德怀到武汉参加华北军事会议。二十日，周恩来、彭德怀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说：“蒋对人、枪、钱都抓得紧，不愿我军扩大，不肯发枪加钱，加发了临时犒赏费五万元。”^③第二天，他们又电告书记处：“补充师名义，（蒋）不肯，且不允增经费。”^④以后，经周恩来等反复交涉，蒋介石勉强答应增加五万元米贴，补充少量衣服，允发善后费和少量轻机枪，但扩编问题仍未解决。

由于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扩编问题长期拖延不决，六月十九日，周恩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后，写出十条书面意见，送交蒋介石。这十条意见，除坚持持久抗战、扩大民主权利等外，对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问题提出了以下要求：一、请明令划定延安等二十三县为陕甘宁边区，组织边区政府，直属行政院，并请委任林祖涵（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二、请扩编第十八集团军为三军九师，所属游击部队按各战区所属游击部队同等待遇；三、请增编新四军为七个支队；四、请依同等待遇，按时补充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以枪械、弹药、被服、粮秣及卫生、通讯、交通等器材。但对这样合情合理的要求，蒋介石的态度仍是敷衍搪塞。七月二十六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说：

① 周恩来等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38年2月10日。

② 周恩来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毛泽东的电报，1938年1月5日。

③ 王明、周恩来、博古、彭德怀致毛泽东、洛甫的电报，1938年1月20日。

④ 王明、周恩来、博古、彭德怀、叶剑英、董必武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8年1月21日。

“日前与林（伯渠）同见蒋后又见何（应钦）”，“对扩大八路军军事，他们借口二百师已满额，只允给其他名义，不愿给师的番号”。^① 这样，问题实际上仍没有解决。

周恩来在武汉时期同蒋介石的这段谈判，进行得异常艰苦。因为日本侵略军队正继续向中国内地扩大进攻，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在表面上一直做出愿意合作的姿态，实际上却对党权、政权、军权始终紧抓不放。尽管周恩来抱着很大的诚意，做出重大的努力，两党关系在表面上还能维持和好相处的局面，但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而新的危机却在悄悄地潜伏并滋长。

周恩来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中的一件大事。这年三月下旬以后，周恩来在武汉时期的很大一部分力量是用来做这方面的工作，白天他在政治部办公，晚上才回八路军办事处去。

这件事在开始时也经历了一段曲折。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下面设四个厅，第三厅是管宣传的。蒋介石想请刚从日本归来的郭沫若当厅长。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三厅主任秘书阳翰笙回忆说：“蒋介石他们的如意算盘想得很美：有周恩来、郭沫若这样众望所归的人物，又通过郭老延揽大批文化、学术、文学艺术各界著名人士，同时将三厅掌握在自己控制之下，让周恩来做空头副部长，郭沫若做空头厅长，既装潢了门面，又羁縻了人才，这便是蒋介石心目中的‘改组政府机构’。”^② 而中国共产党却是要把政治部第三厅建设成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机构，用来推动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宣传运动，唤起全民族的抗战意识，以利于发动全国人民进行全面抗

^① 周恩来致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的电报，1938年7月26日。

^② 阳翰笙：《风雨五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67页。

战，突破国民党的片面抗战。

郭沫若和文化界许多进步人士，最初不愿到这样一个机构去工作，认为在国民党控制下，第三厅办不成什么事情。郭沫若还表示：“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让我处在自由的地位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力一点。我相信，我一做了官，青年们是不会原谅我的。”^①

周恩来耐心地做了许多说服工作，对他们说：要知道第三厅是个政权组织，政权组织的作用是很大的，我们不能小看它。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要求政府改组，政权公开。国民党就是寸权不让，死不公开。为什么？他说是要一党专政嘛！我们如果有一个政府机构，哪怕是很小的机构，也可以利用它为全面抗战做许多事情。目前是要突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到前线去，到后方去，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使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现在许多人想到前线去工作，去拍新闻片，国民党就是不允许。如果没有他们司令长官的同意，他们就可以说你是汉奸，把你枪毙或活埋了。我们拿着三厅这个招牌，就可以用政府的名义，组织团体到前线去，也可以到后方大大小小的城市乡村去，公开地、合法地、名正言顺地进行宣传，既可以宣传民众，也可以宣传士兵。政权机构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我们的工作意义就在这里。大家应该热情地又很清醒、很有警惕地去参加第三厅的工作。

他又对郭沫若说：“考虑是可以的，不妨多多听听朋友们的意见。在必要时我们也还须得争取些有利的条件。但我们可不要把宣传工作太看菲薄了。宣传应该把重点放在教育方面去看，我倒宁肯做第三厅厅长，让你做副部长啦。不过他们是不肯答应

^① 郭沫若：《洪波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19页。

的。老实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①

郭沫若是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后，在起义军南下途中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但他的党员身份并没有公开。起义失败后，他经周恩来同意，流亡日本。在日本十年期间，对历史学、文学、古文字学等都做出了优异的成绩，而同党的组织中断了联系。抗战爆发前夕，蒋介石为了想借重他的声望和影响，请他回国，取消对他的通缉令。回国后，郭沫若恢复了党的关系。经过周恩来的说服，他同意担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但希望能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公开地、痛痛快快地工作。周恩来又劝勉他服从党的需要，还是以非党人士身份，忍受住内心的“寂寞”为好。郭沫若服从了党的决定，仍以进步文化人士的身份来领导第三厅的工作。

蒋介石原来的打算是让周恩来和郭沫若当“空头副部长”和“空头厅长”，因此又安排刘健群来当第三厅的副厅长，想由他来掌握第三厅的实权。这件事关系重大，郭沫若采取断然拒绝的态度。他对陈诚说：“刘健群是一位干才，就让他做厅长好了，何必要把我的名字加上去呢？”陈诚竟回答：“你的大名是连借用一下都不允许的吗？”^② 不仅如此，陈诚还想先造成既成事实来逼迫郭沫若承认。一九三八年二月六日，陈诚请郭沫若吃午饭。政治部拟议中的高级人员，除周恩来以外都到了，其中也包括刘健群。饭后，陈诚说是要开第一次部务会议。郭沫若毫不客气地说：“我自己实在太冒昧。我事前并不知道，今天这会是部务会议，而我竟冒昧地参加了。我自信，我自己还没有充当第三厅厅

① 郭沫若：《洪波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19、20页。

② 郭沫若：《洪波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21、23页。

长的资格的。”^① 他得到周恩来同意，索性离开武汉，跑到长沙去了。二月十七日，周恩来写信给已到长沙的郭沫若，告诉他：自己原则上决定干，“惟须将政治工作纲领起草好呈蒋批定后，始能就职，否则统一思想、言论、行动诸多解释，殊为不便”，^② 并请郭也采取这个立场。政治部正式举行的第一次部务会议是在二月十九日，周恩来和郭沫若都没有出席。陈诚在会上报告说：在第三厅尚未组织成立以前，所有宣传事宜暂由秘书处代为办理。以后的十二次部务会议，周恩来和郭沫若也没有出席。这样一来，蒋介石和陈诚都感到不好办了。恰好刘健群因桃色事件离开武汉，副厅长人选问题就出现了转机。二十四日，周恩来写信给郭沫若已说到：“前日去会辞修（即陈诚——编者注），适你的来信正到，他看完后给我看”，“关于副厅长，他说可即要范扬先生担任，厅长仍唯一希望于你。”周恩来向郭沫若明确表示：“我根据他谈话情形，认为你可以干。”他还叮嘱：“速将宣传纲领起草好，以便依此作第三厅工作方针”。^③ 三月一日，郭沫若回到武汉，并向陈诚提出三项条件：一、工作计划由我们提出，在抗战第一的原则下，应该不受限制；二、人事问题应有相对的自由；三、事业费要确定，预算由我们提出。这次，陈诚的回答很干脆：件件依从。

由于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周恩来和郭沫若在三月二十八日才第一次出席政治部部务会议。郭沫若在会上报告说：第三厅正在加紧筹备，决定四月一日开始办公；^④ 关于第三厅主管业务，现正草拟整个方案及计划。四月一日，第三厅在武昌的昙华林成立。它的组织设三个处：第五处，掌管动员工作，由胡愈之任处

① 郭沫若：《洪波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21、23页。

②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140页。

③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142页。

④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14次部务会报记录，1938年3月28日。

政治部第十四次部务会报纪录	
時間	三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時
地點	本部會議室
出席人	黃琪翔 周思來 趙志強 賀衷寒
	康澤 郭沫若 柳文述 彭國棟
	莊明達 黃和春 郭其材 徐會之
	孫仙雲 梁幹省 杜心如 何聯奎
主席	部長黃琪翔
紀錄	費侍著
開會如儀	
中報增刊項	

一、秘書處抄送長報告	
1. 全國黨部統一組織邊防口現交設計委員會辦理	
建第一廳第五處建立北防。	
二、秘書處建廳卡報告	
1. 本部現正編造預算，請各廳及秘書處速將所需經費呈報。	
2. 前奉部長面諭：本部及九級政治部應降臨以印。	
印制費，由秘書處撥付，並此項撥付應照例呈報。	
張信各處印費如何開支，請指示。	
三、第一廳賀廳卡報告	

1938年3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第14次部务会报记录

长；第六处，掌管艺术宣传，由田汉任处长；第七处，掌管对敌宣传，由范寿康任处长；阳翰笙担任三厅的主任秘书。科长和科员中还有：张志让、洪深、杜国庠、冯乃超、史东山、应云卫、马彦祥、冼星海、张曙等。其中，有共产党员，也有非党的文化界进步人士。这个阵容，可说是极一时之盛。周恩来对参加第三厅工作的共产党员说：“我们到第三厅去，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工作，去斗争，去坚决斗争，而且是一种非常尖锐复杂的斗争。我们要有高度的警惕性，要有很高的策略思想，不要那么天真，不要那么盲目乐观，工作是不会一帆风顺的，但也不要悲观。你们三厅的人要团结起来，要放手工作。”至于对国民党那个鼓吹“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政治部宣传大纲，周恩来说：“我们宣传我们的十大纲领，各人宣传各人的。对他们那一套，我们是不管、不理、不睬，怕它什么？”^①

第三厅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是举行抗战扩大宣传周。四月四日上午，周恩来代行主持的政治部第十六次会议上，郭沫若报告道：本部主办武汉各界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自本月七日起开始。工作部门分文字、宣讲、歌咏、美术、戏剧、电影、游行等。张志让、田汉、范寿康又分别作了一些具体说明，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而这只是第三厅成立的第四天。七日，继续由周恩来主持的政治部第十七次会议上，范寿康又代表第三厅报告：定于本日下午七时召集武汉各界举行火炬大游行。于是，声势浩大的抗战扩大宣传周开始了！

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所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抗日宣传活动。怎样搞好这次宣传？周恩来早就同第三厅一起进行了多次的研究。他说：这次扩大宣传，一要扩大宣传的对象，二要扩大宣传的范围。要深入到劳动阶层中去，

^① 阳翰笙：《风雨五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78、179页。